

形而上的困惑与追问

现代中国文学的思想寻踪



张先飞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Z210

形而上的困惑与追问

现代中国文学的思想寻踪



河南大学出版社



79585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形而上的困惑与追问/张先飞著.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4. 9

ISBN 7-81091-258-5

I. 形… II. 张… III. ①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②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86636 号

出 版 人:王刘纯

责任编辑:纪庆芳

责任校对:辛 媛

责任印制:苗 卉

装帧设计:张 伟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475001

电话:0378—2864669(行管部) 0378—28250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E-mail:bangong@hupress.com

经 销 河南省新华书店

排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印务公司

印 刷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8.375

字 数 188 千字

印 数 1—1000 册

ISBN 7-81091-258-5/I·221

定 价 1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高翔远举

夏尔·波德莱尔

飞过池塘，飞过峡谷，飞过高山，
飞过森林，飞过云霞，飞过大海，
飞到太阳之外，飞到九霄之外，
越过了群星灿烂的天宇边缘，

我的精神，你活动轻灵矫健，
仿佛弄潮儿在浪里荡魄销魂，
你在深邃浩瀚中快乐地耕耘，
怀着无法言说的雄健的快感。

远远地飞离那致病的腐恶，
到高空中去把你净化涤荡，
就像啜饮纯洁神圣的酒浆，
啜饮弥漫澄宇的光明的火。

在厌倦和巨大的忧伤的后面，
它们充塞着雾霭沉沉的生存，
幸福的是那个羽翼坚强的人，
他能够飞向明亮安详的田园；

他的思想就像那百灵鸟一般，
在清晨自由自在地冲向苍穹，
——翱翔在生活之上，轻易地听懂
花儿以及无声的万物的语言。

（郭宏安译）

导 言

—

从前苏格拉底时期开始,认识自己就逐渐成为哲学思考的最高目标,但这个所谓哲学最高目标的“自我之谜”,实际上也是文艺家持久关注与考量的核心,不过哲学家与文艺家,对这一问题表现出不同的思考与询问方式,正像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所指出的那样,文学家所关注的是为哲学家所遗忘的具体的“人”的“生命的世界”,他们的目标是探寻存在的各种不同的维度。^①我们从西方文学来看,相当多的文学家都怀着极浓厚的对“人”的本质、人性的诸问题进行“形而上”追问的兴趣,并且满怀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深层探询的热望,这使西方文学对人性的思考表现出相当的深度。而在现代中国,自新文学以来,许多文学家也显现出对“生命的世界”的强烈的认识与解答的兴味,但由于特殊的时

① 请参阅《小说的智慧》,艾晓明编译,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11~129页。

代境遇,以及看重现世的文化思想传统的影响,现代中国文学家对抽象的人性问题的思考并不太热心。针对这种现象,一些现代文学研究者,如夏志清先生就对现代中国文学下过这样著名的断语——现代中国作家缺乏宗教感,更多地体现出“感时忧国”的情怀^①,这一论断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具有极强的概括性,因为就现代中国文学家的大多数而言,他们的确缺乏对形而上的人类本质问题、人类存在的终极问题,以及人性的渊深进行深层探究、持久询问的意识,国家民族的现实出路、人们的现世生存,即具体的历史的现实,才是他们关注的焦点与思考的中心,他们不会,也不愿跳出现实迫切、紧急的生存艰难,把精神追求放置于“玄虚”的“人”的本质、宇宙的本质的探究之上。这种状况在1927年之后表现得更加明显,在愈加深重的国家民族的危难之中,相当多的文学家不但不大可能有此种“闲情逸致”,甚至在有些人看来,在这样的生存艰难之中,这种“玄虚”的思考本身就是一种罪过。应该说类似夏志清先生这种论断的见解在现代文学界,乃至当代思想界都颇具代表性,但是论者认为这种论断并不能概括现代中国文学的全部,现代中国仍有相当一批的文学活动者一直把目光投注于这些形而上的“人”的问题的探究之上,因为从本质上讲,对这一问题的探究本来就是“人”生存的一种迫切的需要。

应该说,在西方被哲学所遗忘的具体的“人”的“生命的

① 请参阅夏志清著《〈中国现代小说史〉作者中译本序》、《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均见《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友联出版社有限公司,1979年第1版,1~20页,459~477页。

世界”，在现代中国很大程度上也被哲学思考所遗忘^①，对这一领域的思考主要由现代中国的文学家们担当了下来，而在其中，有一批文学家表现出对形而上的人类本质问题、人类存在的终极问题，以及人性的渊深进行深层探究、持久询问的意识，他们并对此做了深入思考。关于现代中国文学家的哲思，贺麟先生曾有过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观察，他非常准确地指出，在现代中国，文学与哲学发生了相当密切的关系，不少文学活动者在其作品中显现出深层的哲学思考。但是在他看来，这些表现出哲学思考深度的文学家，其思考不过是作为现代中国哲学思考的一部分，这些思考在一定程度上是不能替代哲学研究的。^② 他的这个看法似乎有些偏颇，实际上，这些文学活动者对世界的深层思考，不同于普通的哲学思考，它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考方式与独特的思考命题。在论者看来，正由于这些文学家对世界的深层思考的特殊性，使得他们的思考活动在现代中国的思想发展中有着极为特殊的重要意义：正是由于它们的加入，现代中国的思想才不至于成为不完全的世界思考，现代中国对于整个世界的意义探求才是完整的。另外，这些现代文学家同现代中国大多数的

① 当然也有少数的哲学思考者涉及这个领域的思考，贺麟先生在《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中标举出一些重要人物，如王国维、梁漱溟、方东美等哲学思考者，宗白华、蔡元培等美学思考者，还有一些宗教哲学家与伦理学家，不过有时候很难把他们的论述严格划归于哲学式的思考，而与文学式的思考截然分开，实际上，这在近世中、西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见贺麟著《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年3月第1版，1～61页。

② 请参阅贺麟著《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60～61页。

哲学思考者不同,他们更多是从自己直接的生存感受、精神需要出发,表达出自己鲜活的思想(虽然他们不免受到西方命题的影响,甚至在其框架之内思考),即他们能够提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命题,发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实际上这些也正是现代中国自己的命题、自己的声音,他们对这些问题所做出的多种形式的独特思考与回答,显现出现代中国原创思想的丰富性。而从严格意义上讲,哲学在这方面的贡献却并不尽如人意。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充分地认识到,现代中国的一批文学家对形而上的“人”的本质问题、人类存在的终极问题,以及人性的渊深等领域的深层探究、持久询问,是现代中国的一种重要的精神现象,这些文学家对这些领域的思考为现代中国思想的发展做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但这些问题的重要价值与意义,在现代文学研究界,以及当代思想界尚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亦未得到较为系统的展开,具体来讲,虽然从各个角度对不同作家在这一层面上的思考的研究,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并非是什么新鲜的课题,但除了极少数学者外,很少有人从整体上考察在现代中国作家们身上所呈现出的这一精神现象,更不用说从这些文学家对现代中国思想发展所做的理论贡献的角度去研究他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了。论者认为,这种研究状况亟待有所改观。

本书中所收录的,正是论者对于现代中国的这种精神现象,以及文学家们的“形而上”思考的精神成果进行初步研讨的一些心得,仍有一些研究尚未完全见诸文字。当然,论者在本书中对这种精神现象的审视必定会是挂一漏万,这种精神现象的形貌也不过现出了冰山一角而已,因为毕竟不论从

探讨的范围,还是从探讨的问题来看,论者的研究都有着一一定的局限。不过,由于这些文学家在现代思想发生发展中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同时他们所探询的问题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论者对这种精神现象的探讨还是具有相当的概括性的,也颇能说明一些最为核心的问题。

二

从19世纪中后期以来,有关“人”的各种形而上之思,与以前的任何历史时段相比,都显得异常复杂与深广,而“人”的问题也成为最为世人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几乎每一个现代的思考者都必须直面这一问题的逼问,没有任何回避的余地,事实上,对于一个现代人来说,这是他们生而为人就必须思考回答的问题,也是他们生存的首要的事情。对于世事纷乱复杂已极,思想极端混乱(或者曰纷杂无序)的现代中国来说,社会对于任何现代人的生存命题都没有一个可供参考的答案,因此每个思考者都要花费更大的精力去寻找答案,因为在一定程度上,这已成为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这种现象在一些现代中国文学家身上表现得异常突出。

现代中国文学家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呈现出十分丰富的样态(modus),他们由各自不同的生存境遇与精神需要出发,从多个层面、多重角度,并以多种形式对“人”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形而上的思考,他们的思考为这一问题的探索做出了深度的推进与发展。不过虽然他们的思考在内容与表达方式上表现出异常丰富的形态,但我们从中还是能够清晰地看到,在这些文学家对具体的人的“生命的世界”所做出的形而

上的思考中,他们最为集中探究的主要是两方面的核心问题,其一,是他们对“人”的本质问题的探问^①,其二则是他们对“人”的超越性精神追求的凝思。

现代中国文学家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正是现代世界思潮的一部分,是现代世界思潮这一“合唱”中的一个独特的“声部”。就他们的具体思考来看,他们所探讨的,正是19世纪中后期以后的西方一些思想激进的文艺家,以及“神思宗之至新者”^②以来的一些人本主义哲学家们所热衷探讨的课题(当然其中也能看到一些传统的关于“人”的形而上之思,不过这些理论的信持者为数很少),应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在这种世界思潮的精神背景下,受到各种世界现代观念的影响,从而展开自己的思考的。不过,他们虽然积极参与了各种现代世界的思潮运动,但是他们的思考依然还是现代中国自己的思考,不仅其思考的起因是源于他们自身直接的生存感受与迫切的精神需要,以及中国语境中发生的种种问题,而且他们所提出的具体命题与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以及他们得出的独特的结论也完全是由自身的存在形态所决定的。

现代中国文学家对这两方面核心问题的追问,大致呈现出这样几种不同的形态:

① 在这些现代中国文学家们对“人”的问题的思考中,与他们对“人”的本质问题的思考紧密相连的,就是对“人”如何在世生存的问题的探讨,而实际上,他们之所以思考“人”的本质问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是缘于他们对于如何在世生存问题的困惑。这一特点明显显现出文学家的哲思与哲学思考的区别。

② 迅行(鲁迅),《文化偏至论》,1907年作,载1908年8月《河南》月刊第7号。

其一，是从“人”的本质观出发而展开的思考。相当多的文学家力图将自己的思考全部建立在他们对于“人”的本质观的认知之上，其中有些人还参与到近世西方人思考“人”的本质的各种哲学思考或思潮运动之中，如周作人，他与许多现代西方“灵肉一元论”者相同，试图将其思考建立于严格的科学的“人”的本质观——即科学的“人学”基础之上。另外还有钱钟书、冯至、汪曾祺等一批作家，他们对“人”的本质观的思考也都表现出相近的特质，至于其中的一些代表人物的哲思，解志熙先生已在其多部重要论著中做过深刻的剖析。而20世纪初的人道主义思潮，也与任何历史时期的人道主义思考一样，是在对“人”的本质观的认知之上建立起自己的话语体系的，不过这一时段内人道主义的“人”的本质观的表现形态较为复杂，其中既包含有科学的“人学”观，又有许多实证科学时代之前的“人学”思考。在这些文学家们中，还有一些人，他们对“人”的本质的思考，更多的是源于个体生命对宇宙、人生的巨大的困惑，强烈的生命冲动驱使他们用自身对生命的直觉感受去探索“人”的本质的奥秘，曹禺^①、沈从文便是其中非常典型的例子。

其二，更多现代中国的文学家，他们对“人”的形而上之

① 在关于“人”的本质的思考中，曹禺的思考表现出一种混杂的状态，他身上既有那种原始方式的对“人”的本质与世界的困惑，又有着现代人对人性的复杂思考，还有审美现代性的因素，各种形态的思考在他身上有着奇异的混合。从这个意义上讲，曹禺真像很多研究者所说的那样，是一个谜。关于这一问题的详细论述，参见拙作《形而上的困惑与追问——论曹禺〈雷雨〉创作时期思想的几个主题》，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4年第4期。

思,并非是源于其对于“人”的本质的有意识的思考,而是源于对“人”的日常生存的关注,由此上升到对“人”在世如何生存的问题的形而上之思,这种形而上的思考主要集中在关于“人”的超越性精神追求的问题之上。现代作家中,老舍在《离婚》等作品中关于“诗意”的思考,以及杨绛对“人”的内在精神的持久关注(相关问题论者在对周氏兄弟形而上思考的论述中已有所涉及)都是十分重要的现象。

不过每位文学家并非固定地表现为某一种思考形态,他的思考可以同时表现出两种形态的特质,而且在不同的时期,同一位文学家也会在思考形态上呈现出相当大的不同,这些都是极为常见的情形,尤其是对于那些思想变动较为剧烈的文学家,这种情况就更加显著了。我们说在这一点上也正充分显现出了文学家的世界思考的独特形态。

现代中国文学家所处的时代,正是科学主义在中国大行其实之时,这些现代文学家基本都受到过科学主义观念的洗礼,他们对科学观念的信仰是矢志不移的。那么这些现代中国文学家在所谓“科学的时代”中对于“人”的深度思考——对“人”的本质与对超越性的精神追求问题的思考,是否就是形而上的“人学”之思呢?在对此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之前,必须首先说明,本书开宗明义所谓“形而上”的困惑与追问,包含有两层意义:一层是从“形而上”的层面对问题的询问、思考,另一层是询问中表现出的“形而上”的思维特征。

首先我们来看这些现代中国文学家对“人”的本质观的思考。从根本上讲,这些思考基本是从抽象的、形而上的立场出发的,虽然有人说这已是“科学的时代”,“人”的本质观

应该可以完全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但实际上,这一要求并没有能够落到实处,即使有些人竭力试图达到这一要求,并标榜自己对“人”的本质观的认知能够实现完全的科学化,可如果我们细致地考察他们的思考结论与他们的思考方式,以及其理论的逻辑推演过程,就会发现,他们对“人”的本质观的思考,仍然根本做不到完全的科学化,它们依然显现出相当强烈的形而上思考的印迹;而他们言之凿凿建立于科学之上的其他衍生观念,则更多是其他的一些抽象理念演绎推导的结果,事实上,这些理念与他们对“人”的所谓的科学认知之间并没有多少直接的关系。这种现代思考的基本特征,在现代中国可以以周作人在各个时期的“人学”观、现代人道主义的“人学”观念,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人学”观为例,因为在这个时代,它们可以算是最具“科学”性的“人学”观了,但这些“人学”观的形而上学的色彩却依然十分浓烈。应该说,这一点已为颇多识者所认识到。关于“五四”前后周作人“人学”观与现代人道主义“人学”观的这一特点,论者在博士论文中已有专章的论述^①,至于马克思主义“人学”观的这一特点,在国内外学界也早有专门的研究。

其次,所谓超越性的精神追求,究其本质而言,它仍是隶属于对“人”的本质观的思考。这些现代中国文学家对超越性的精神追求的张扬,其实是对人的“神性”本质的肯定与推

① 参见论者的博士论文《周作人现代人道主义观念历程——周作人人道主义观念之理论溯源与观念系统的形成暨其演变》(未刊稿),其中第五章《周作人现代人道主义“人学”观——周作人的灵肉一元观》对此问题有过深入探讨。

崇,而这些所谓人的“神性”本质,是所谓纯粹的符合科学要求的“人学”思考中根本无法容纳的东西,但它们却在各种具有强烈形而上色彩的“人”的本质观中经常出现。在现代中国,实际上中西各种形态的“人”的本质观对此问题的回答,都在中国文学家身上有过回应,不过除少数人——如周作人、田汉、宗白华、郭沫若、以“学衡派”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者等等之外,他们往往也并不十分了然自己关于超越性精神追求的命题究竟来自于何种“人”的本质观的思考,他们只是从各自的生存体验出发,急迫地感受到这种要求,然后再把这种迫切的要求形诸言论或笔端,像本书中所讨论的鲁迅、曹禺,以及本书中尚未得以论及的沈从文、杨绛、老舍等人,在这一思考中所显现出的鲜明的形而上色彩,是很少受到他们自己自觉的科学性的反思的。

本书中还有另一个重要部分,即对现代文学的第二代研究者的研究特点的历史分析,其实在这一部分中,更重要的是对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这一时段内人文学科(包括现代文学在内)的研究特点的分析,实际上论者是借此论题对这一时段进行细致而微的思想史考察,其中包括对研究者们精神历程、精神形态的考察。在这一时段,主流意识形态以其独特的话语样式有效地掌控了全部社会生活,而实际上这种话语形式已完全成为民众,乃至研究者们的基本的思维范式。这种话语样式具有极为强烈的形而上色彩,这缘于它赖以生成的特殊的思想传统——欧陆理性主义哲学,尤其是黑格尔传统的影响,再加上教条主义的思想方式。这种话语样式产生于19世纪后期,而从这一时期即已开始,尤其是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以后,这种话语样式通过多方面

的理论拓展,以及在社会改造实践中的广泛运用,在整个世界的思想领域、政治生活领域逐渐形成了一种独异的思想方式,这种思想方式最终成为了一种思想传统,影响了几代人,使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了这种思想方式的执行者,而这种思想方式在中国这片国土上也深深地扎下了根,并且枝繁叶茂,影响深远。^①其实,如果单就这一种话语的理论系统而言,它还并非是完全的传统的形而上学的思维系统,准确地说,它是形而上学的思维系统与科学的理论系统的一种混合体,而其话语形式也是这两种思维方式的混合。但当这种话语系统开始进入到具体的中国的话语环境,深入到中国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当中时,它在中国现实中的具体的运作方式,就不仅决定了民众与知识分子阶层的思维方式完全成为了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这是与科学的思维方式完全相对的),而且同时也决定了它所生产出的知识系统具有形而上思考的特质(当然在这些知识系统中也包括各类人文学科的理论系统)。

对于这种话语系统及其运作方式,相当多的研究者都将20世纪70年代末作为其式微的开端,因为在他们看来,从这一时期开始,研究者们便竭力挣脱开这种话语的控制,并且这一努力在“拨乱反正”时期就已颇见成效,人文学科也正因此获得了巨大的进展。但论者通过细致的思想史考察,发现研究者在“拨乱反正”时期非但没有最终实现挣脱旧话语控制的这一愿望,反而在旧话语的“迷宫”中迷失了方向。应该说,知识分子阶层对旧话语控制的挣脱开始有所成效,

① 与此相反,经验主义的传统在国民精神中留下的痕迹着实不多。

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时至今日,对于大多数的知识分子而言,这种话语系统与思维方式确实已经没有多大市场了,但是在普通民众当中,贯穿数十年的那种情形并没有得到多少改观,事实上,它仍是我们大多数人现实生活与精神生活所处的真实语境。这里必须说明的是,论者在书中所作的分析并没有任何价值、道德评判的意味,这里论者只是在试图说明数十年间在国内占据话语主流的话语系统,以及源于权势话语的思维方式的形而上的特质。而我们说,基于这样的话语系统与思维方式,数十年间,人们对于相当多的社会命题、政治命题、学术命题的思考,正是形而上哲学立场上的困惑与追问。

三

我们从上一节的分析可以看到,对于学界而言,现代中国文学家关于“人”的问题的形而上的思考,的确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但是现代中国文学家们的这种思考本身还有着更为深广的现实思想意义:事实上,正是现代中国的一批文学家对形而上的“人”的本质问题、人类存在的终极问题,以及人性的渊深等领域的深层探究与持久询问,使他们的思考结晶,与现代中国的哲学家、思想家们的理论贡献一样,成为了民族精神发展中的重要积累;而与大多数同时期的哲学思考者不同,这些现代中国文学家,他们更多是从自己直接的生存感受、精神需要出发,表达出自己鲜活的思想——提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命题,发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实际上这些正是现代中国自己的原创性的思想成果,真正的“中国思